

助人，是润物细无声的哲学

专家调查档案

为家庭经济条件拮据的学生提供助学金，本来是一件好事。可是，以公平的名义让这些学生当众讲述自家有多么贫困，却令受助的他们内心很受伤。好事需要恰当的方式去执行，才能收获好的结果。助人，绝不只是给钱那么简单，这是一门学问。

【事件回放】

小刘告诉记者，她是外地来沈读大学的学生，家境贫困，可正是贫寒的家境养成了她好强不服输的性格。“我最不爱在别人面前说我家里的情况，不想让大家知道我困难，不想让人同情，更不想成为别人的笑柄。”小刘说，“可现在要认定贫困生资格，拿助学金和奖学金，就必须在全班同学面前讲我家困难的情况，真是开不了口！”

学院为了公平公开，在认定贫困生资格的环节上，每位提交申请的学生除了要上交贫困认定材料外，还要在同学面前将自己贫困的家境和盘托出。随后投票选举，得票最高的前5名才能获得资格。“有的人愿意讲，得票自然多，可像我这样不爱讲的，肯定没人投给我啊！这样真的公平吗？”小刘无奈地说：“在全班同学面前当众揭伤疤，还公开选谁家最困难，认定贫困等级又不是选美、选举，凭啥让我们站在那么多人面前丢人现眼？”

(来源：沈阳晚报)



插图 孔雀

A 公开讲述家庭困难令受助者很受伤

在一个教室里上课的学生，有的家庭经济条件充裕，有的比较拮据，都是正常的，只是，大多数情况下，那些家庭条件比较差的学生并不愿意把家里的拮据向其他人和盘托出。几年前发生的马加爵的事件让人触目惊心，马加爵之所以杀人，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和同学相处时，有些人会有意无意地谈到他的贫穷。身为心理咨询师

的廖丽娟曾看过访谈马加爵的视频材料，在视频中马加爵说：“笑话我土和穷，没有关系，怎么可以笑话我的母亲。”视频资料中透露出的信息是，马加爵的同学都知道马加爵的母亲是辛苦糊纸盒来供这个令全村人都为之骄傲的孩子读大学的。为什么同学们都知道这么具体的情况？因为申请助学金的时候，需要这样的资料，而且越详细越

好。看到这些材料的学生对同学的隐私不尊重，必然就会流传得大家都知道。“某种程度上，是同学之间私底下的传言、议论，催生了马加爵的悲剧。至于当着同学们的面演说自己的家庭有多么困难，这会给当事人带来怎样的心理体验？”“尊重的需要是人的基本需要之一，所谓基本需要，就意味着得不到满足，就容易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问题者譬如马加爵，小问题譬如经过这样公开演说的孩子会感觉到处处抬不起头。”

B 全班投票决定助学金归属未必真的公平

贫困生资格是否能够被认定，能否获得助学金，要有全班同学投票决定，这看似公平的团体决策方式，真的就公平吗？

廖丽娟指出，在群体中人有时候会出现某些具有很大危害性的现象。“在群体中，人们的自我意识被弱化，个体的特征被模糊，这个时候的个体会更不自控，更不自律，也更可能毫不顾及自己的价值就做出

行动，对情境的反应性也更强烈。因为不用顾及自己的价值，也不用为自己的决策负责任，这个时候的决策往往就会不那么负责任，更容易带着一些情绪，甚至是在个体单独时候不愿意暴露出来的阴暗面。”

联系到新闻中，想要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必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讲自己家庭的贫困状况，廖丽娟分析说：“因为容易有情

境性的反应，这个时候的决定往往会容易被渲染，被演讲同学的演讲带出来的气氛渲染，也会容易被整个班级的氛围所渲染。那么做出的决策，有多少客观和公平？只有那个团体当时的情境，只有演讲者的演讲水平，还有内心无需顾及价值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可能和本身的评价内容完全没有关系。这样做出的团体决策真的公平吗？”

C 助人不只是把钱发出去就完事

要让助学金真正帮助到那些需要得到帮助的学生，同时又能保护他们不受到不必要的伤害呢？廖丽娟给出了一些建议。

首先要明确的是，公平在于评价标准的贯彻实施，与是否公开没有直接的关系。同样是听取大家的意见，可以采用更加人性化的方式，比如，制定一些比较细致的标准，每一个标准下面都有分数来标识。把这样的表格发到每一个同学的手中，让他们投到某一个特定的信箱，由专人统计分数，分数高的学生可以进入需要帮助的范围。这样的打分会相对更客观和公平一些。那些打分的人甚至不用看到任何个人的信息，最后只需要极少数人来打开那些进入

助学范围的学生的个人信息。如果需要知道受助学生更多的信息，也可以在这个邮件里面附上个人自述，并且向学生保证这些自述，会用怎样的方式被阅读，以及会怎样保证他们的隐私得到尊重。

其次，是给指标还是根据标准来进行评定，也是需要考量的。我们会发现，很多时候都是一个班级或者一个年级有若干个帮困指标。助学帮困的本意是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而不是希望每个班级帮到一两个。廖丽娟建议，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无需制定硬性的指标，尽可能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就好。如果金额不够，可以试着寻求社会资源的帮助。只要评价方式

和标准是合理的，来自社会的助学金会容易聚拢起来，流向最需要帮助的那些学生。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助人是漫长的路，不是把钱发出去就完事的。或者说，如果给了一笔钱，结果带来的却是受助者很多年的难过、心里不舒服甚至是伤害，那何必给这样一笔钱？如果孩子因为当初领了这笔钱，很多年以后需要花费很多钱去找心理咨询师来疗伤。那恐怕就违背了助人的初衷。

给一笔助学金是助人，为孩子争取勤工俭学的机会是助人，帮助孩子更自信更坦然面对苦难是助人……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给予帮助，对于一个年轻的生命会是一个温暖的助推力。



敬畏之心

◎ 童孟侯

我对国旗有感觉，是从歌剧《江姐》开始的：新中国即将成立，关在重庆集中营里的女共产党员们，在牢房里集体绣红旗，她们热泪盈眶，她们泣不成声，一是因为激动，二是因为遗憾，因为她们即将被押赴刑场，她们是看不到五星红旗在天安门高高飘起的。

我当时就思忖：换作是我，对于根本没有指望的东西会有如此期待，如此深情吗？这就是我和江姐们的不同境界。

早前，我去拜访莎拉·伊麦斯女士，她的爸爸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逃到中国来的犹太人，住在上海大名路一带，做一点生意。“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从来没有离开过中国的莎拉受到了冲击，抄家、批斗、下乡、甚至坐牢。红卫兵说莎拉是外国特务，必须在她身上“踏上一只脚”！

“文革”结束了，有关部门大概觉得有点对不住莎拉，1985年，同意她带上全家回到她的祖国以色列。可是，莎拉还是热爱中国，她给儿子起名字叫：以华，以色列——中华。后来，世界第三大钻石公司、以色列的罗斯蒂克公司要进入中国，莎拉做了中国钻石市场总代表，她回到了上海。

2009年国庆节，新中国成立60周年。那天，莎拉正好要出差，她关照儿子以华，在自己家的阳台上撑出一面五星红旗，而且要挂三天。

第三天，莎拉回家来，进入小区抬头一看，她家的阳台上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然而，整个小区只有她的家挂出了一面国旗，没有第二家这么做。

她百思不解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只有我挂国旗？在以色列，国庆那天，家家户户都挂国旗的，虽然没有命令他们这样做。

莎拉问我这是什么道理？我无言以答。

那段时间，莎拉的疑问有了答案，当“钓鱼岛事件”发生以后，当日本右翼势力甚嚣尘上的时候，大街小巷川流不息的私家车上，都挂起了国旗，贴上了国旗。我们到处可以看到国旗了。



专家支持：廖丽娟 国家一级心理咨询师
采访：朱砂 上海市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心理咨询师考评员